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Perception and Policy about South Korea (1978-1992)

Zhihua SHEN

Abstract: In examin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South Korean relations,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various factors changed China's perception and policy about South Korea and led to Beijing's sudden decision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Seoul. Reform and opening changed China's view of the world and understanding of foreign relations, establishing the premises for all readjustments to follow. China strived to grow production rapidly by joining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end the predicament of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and create a new order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Hindered by North Korea's concerns and objections, China's shift to a "Two Koreas" policy needed to follow reconciliation and mutual recognitions between the two Koreas. Beijing saw the Roh Tae-woo administration as a rar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achieving normalization of Chinese-South Korean relations.

Keywords: Sino-ROK Relations, Sino-DPRK Relations, China's Policy on Korean Peninsula

Author: Zhihua SHEN was born in 1950; Senior Professor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Eurasian Studies,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Co-Director of the NYU Shanghai-ECNU Center on Global History, Economy and Culture, and a Senior Fellow of 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he Cold War,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Sino-Korean relations. He has published many articles in top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s listed in SSCI, A&HCI, and CSSCI; many of his boo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numerous languages including English, Japanese, Korean, German, Russian, etc. Important books authored include *Zuihou de "tianchao": Mao Zedong, Jin Richeng yu Zhong Chao guanxi, 1945-1976* [The Last "Heavenly Dynasty": Mao Zedong, Kim Il-sung and Sino-DPRK Relations, 1945-1976], 2017, 2018 editions; *Wunai de xuanze: Lengzhan yu Zhong Su tongmeng de mingyun* [Reluctant choice: the Cold War and the destiny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2013; *Mao Zedong, Sidalin yu Chaoxian zhanzheng* [Mao Zedong, Stalin and the Korean War], 2007, 2013, and 2017 editions; *Jingji xuanwo: Guancha Mei Su lengzhan fasheng de xinshijiao* [Economic Vortex: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Reinterpreted], 2022.

中國對韓國認知和政策的轉變 (1978—1992)

沈志華

[摘要] 通過梳理中韓關係發展的歷史過程，本文認為影響中國改變對韓國認知和政策以致突然做出與韓國建交決定確有諸多因素，其中由改革開放引發的中國整體外交理念和方針的轉變是一切變化的邏輯基礎；在經濟上迅速發展生產力並融入國際體系，在外交上擺脫被孤立和圍困的國際環境，從而建立“冷戰”結束後新的經濟秩序和政治秩序，是中國的需求和動力；中韓關係發展最根本的障礙是中國不得不顧及朝鮮的感受和反對；中國轉向“兩個朝鮮”政策的基本條件是實現南北和解和交叉承認；在盧泰愚任期內實現與韓國關係正常化，是中國必須抓住的稍縱即逝的歷史時機。

[關鍵詞] 中韓關係 中朝關係 中國的朝鮮半島政策

[作者簡介] 沈志華，1950年出生，華東師範大學資深教授，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院歐亞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紐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全球歷史·經濟·文化聯合研究中心主任，美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資深研究員。研究領域為冷戰國際史、蘇聯史、中蘇關係史、中朝關係史。在國內權威學術期刊和國外SSCI、A&HCI來源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多篇，多部著作在國際上被譯成英文、日文、韓文、德文和俄文等語言。代表作有：《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1945—1976）》（2017、2018年）、《無奈的選擇——冷戰與中蘇同盟的命運》（2013年）、《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2007、2013、2017年）、《經濟漩渦：觀察美蘇冷戰發生的新視角》（2022年）。

研究1978—1992年中國對朝鮮半島政策的轉變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從朝鮮戰爭結束至1960年代末，朝鮮半島一直處於尖銳的“冷戰”對峙狀態。1970年代初，由於中美和解，且中美在半島問題上達成戰略共識，核心是尋求東北亞地區的和平穩定，中朝關係以及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政策悄然發生變化，其特點是，一方面中朝對外政策出現分歧，中國聯美制蘇，朝鮮聯蘇抗美，另一方面出於安全和意識形態的考慮，中國又必須延續與朝鮮的盟友關係，維持“革命國家”的形象，處處維護朝鮮的利益。因此，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政策陷入某種困境，在與美國合作處理朝鮮問題的過程中（尤其是1974年以後）基本採取消極回避的立場。^①在此後的十幾年中，中國國內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風雨無阻地開始“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國際局勢逐步走向緩和，進入“冷戰”後期和後“冷戰”初期，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首先，中美關係實現正常化，雖一波三折，但終歸趨向穩定發展，雙方的關係定位從策略層面轉向戰略層面。^②其次，東北亞原有的兩個三角同盟對抗局面逐漸解構，美國提出的“交叉承認”原則事實上得到中蘇朝三國的認可，雖未全面實現，但對推動地區局勢緩和還是發揮了重要影響。最後，中國的半島政策發生了根本變化，從只承認“一個朝鮮”轉向同時承認“兩個朝鮮”，中韓建交雖步履蹣跚，但最終“水到渠成”，從而導致東北亞地區國際關聯式結構發生重大轉變。其中最令史家感興趣的是中國對韓國認知和政策的轉變。

一、以往學界關於中國決策變化的討論

目前，中國決策層對韓國認知和政策如何改變的檔案文獻尚未解密，研究者可以利用的只有中國領導人的年譜、公開文獻和當事人的回憶錄。儘管如此，鑒於中韓建交後兩國關係的極速變化及其對東北亞經濟和安全格局的深遠影響（包括朝核危機的爆發），學術界還是對促進中韓關係變化、中國決策改變的原因和依據展開了廣泛討論。從歷史學界的研究看，人們提到了下列因素：1.中蘇關係緩和，為北京改善與首爾的關係減輕了來自平壤的壓力；2.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必須擺脫外交孤立的困境，韓國成為一系列亞洲國家中的重點；3.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政策，韓國成為經濟支持的重要來源；4.東歐和蘇聯與韓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為中國改變與韓國的政治關係做了外交鋪墊；5.受到臺灣積極開展“銀彈外交”的刺激，中國必須壓縮臺灣在國際上的外交空間；6.朝鮮和韓國同時加入聯合國，為中韓建交掃除了政治障礙；7.“冷戰”結束後中國實行以亞洲為中心的外交政策，韓國成為潛在的夥伴；8.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中國成為西方進行“和平演變”的唯一目標，而中國則把韓國作為分化西方陣營最薄弱的環節。其中，有的學者突出強調某一因素，有的學者綜合羅列出幾種因素。^③

然而，到目前的討論似乎並沒有把問題說清楚。首先，需要說明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和整體外交理念發生了怎樣的改變，這是中韓關係變化的基礎和基本因

① 詳見沈志華：〈中美和解與中國處理朝鮮問題的困境（1971—1976）〉，《南國學術—澳門大學學報》2024年第1期，第32—45頁。Shen Zhihua, “Allies in Trouble: The Direction of Sino-Korean Relations amid the US-China Rapprochement, 1971-1976”, *China and Asia*, No. 6, 2024, pp. 32-59.

② 毛澤東決心打開對美關係的大門，主要是出於對國家安全的考慮，屬於外交策略的轉變。鄧小平決定儘快與美國建交，發展對美關係，除了安全問題，更主要的是對世界和平和中國發展道路的考慮，因此他一再強調中美關係是戰略問題。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788、825—826、874—875、897—898、1293—1294頁。

③ Kim Samuel, “The Making of China’s Korea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in David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374-375, 381; Don Oberdorfer, *The Two Koreas: A Contemporary History*, New Edition (Indianapolis: Basic Books, 2001), p. 246; Chung Jae Ho, *Between Ally and Partner: Korea-China Relations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69-70; Park Hun-Bong, “The Factors Why China Changed to a De Facto ‘Two Koreas’ Policy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1985 and 1988”,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No. 77, 2015, p. 317; 李東律：〈韓中建交中“朝鮮因素”的變化及影響〉，《韓國與國際政治》第34卷第3期（2018年9月），第151—178頁（이동률, “한중 수교에서 ‘북한요인’의 변화 및 영향”, 『한국과국제정치』, 제34권 3호 (2018. 9), 제151—178쪽); 董潔：〈中韓建交中的中國決策再探討〉，《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8期，第103—115頁；Son Daekwon, “When Beijing Chose Seoul over Pyongyang: China-South Korea Diplomatic Normalization Revisited”, *The China Quarterly* (2023), 256, pp. 960-976.

素。其次，中韓關係經歷了十幾年的變化過程，在影響中國決策的諸多因素中究竟哪一個因素在哪個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需要區別開來。最後，在這諸多因素中還需要分清哪些構成了中國改變對韓關係的需求和動力，哪些屬於阻隔中韓關係發展的障礙，又有哪些在中國決策者看來是中韓建交必須具備的條件。只有對上述因素做出準確的定位，才能比較全面理解中國決策的原因和根據。為此，有必要對中韓關係變化直至兩國建交的歷史過程進行簡要回顧，重要的是指出中國決策變化的關鍵節點。^①

二、對中韓關係演變的簡要回顧

中韓兩國從70年代末開始接觸到90年代初建立外交關係，經歷了十幾年漫長的成熟期，其結果恰如中國外長錢其琛所說的——“水到渠成”^②。

（一）中國提出“關門不上鎖”的方針

《老子·八十章》有云：“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正是朝鮮戰爭結束後直到1970年代末中韓兩國關係的真實寫照。中美和解以後，韓國外務部就提出應調整對華政策，“改善與中共的關係”。^③1973年6月23日，韓國總統朴正熙發表《特別外交宣言》，向北京伸出橄欖枝，但遭到中國的冷遇和抵制。中美建交後，韓國再次表現積極，中國繼續冷淡處之，僅允許少量僑民往來走動。到1979年下半年，韓國突飛猛進的經濟發展及其經驗引起中國經濟學界和領導人的特別關注，鄧小平在1978年5月就提到“四小虎”。^④為此，中國外交部1980年1月提出對韓“關門不上鎖”的方針，不過強調的重點是“關門”。^⑤中韓民間的間接貿易悄然開始，且迅速發展。但在朝鮮表示不滿和抗議後，中國立即止步，並於1982年6月下文停止中韓貿易。^⑥

（二）“一個朝鮮”的政策開始出現鬆動

1983年5月5日發生的卓長仁劫機案是一個突破口，中韓政府開始直接接觸、談判，並簽署了官方協定。這一突發事件的處理，為中國承認韓國的合法存在打開了一個缺口。7月20日，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討論了調整對南朝鮮的政策和如何安撫朝鮮等問題。^⑦隨後中國外交部做出正式規定：在國際多邊活動中允許韓國人員來華和中方人員去韓。^⑧“一個朝鮮”的政策由此開始鬆動。

1983年10月朝鮮策劃和實施的仰光爆炸案引起中國強烈不滿，也推動了中韓關係的發展。1984年中國掀起改革開放第二波高潮，1—2月鄧小平視察經濟特區並給予充分肯定，5月中國開放14個沿海城市，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因此，中國更加重視韓國經濟起飛的經驗。在此期間，鄧小平多次指示要調整對韓關係，強調改善與韓國的關係具有戰略意義，並讓胡耀邦給金日成帶話（4月），中國與韓國改善關係對朝方也是有好處的。^⑨

（三）推出“官民有別、政經分開”的對韓政策

1985年3月發生的魚雷艇事件，又一次為韓國提供了利用意外事件接觸中國政府、改善對華關係的機會。與1983年劫機事件處理方式不同，韓方將嘩變的中國士兵連同艦艇一起歸還，

① 為節省篇幅，以下對歷史過程的描述，凡已被學術界反復使用的史料不再出注。

② 錢其琛：《外交十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146—148頁。

③ 韓國外交史料館，C-0051-03，第15—17、18頁。

④ 見《經濟研究參考資料》1979年總160、177、193、194、195各期；《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第320頁。

⑤ 黃華：《八十年代外交形勢、政策與今後的任務》，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81年，第29—30頁。

⑥ 對外經濟貿易部辦公廳編：《對外經濟貿易重要文件彙編（截至1982年底）》（下冊），北京：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1984年，第269—270頁；韓國外交史料館，2012-0028-17，第122頁。

⑦ 本書編寫組：《李先念年譜》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01頁。

⑧ 錢其琛：《外交十記》，第150頁；張庭延：〈鄧小平關心朝鮮半島局勢〉，《黨史博覽》2013年第5期，第28頁。張文中說外交部做出上述規定的時間是1982年7月，應該是記憶有誤。

⑨ 張庭延：〈鄧小平關心朝鮮半島局勢〉，《黨史博覽》2013年第5期，第28頁。

令中國政府深為感動。更重要的是，通過這次突發事件的處理，建立起中韓政府之間的“香港渠道”，即雙方通過韓國駐香港領事館和新華社香港分社溝通情況，交流信息。根據鄧小平的指示，中央外事小組在5月會議上決定，對韓國開始非官方接觸，逐步開展經貿、文化和科技交流。^①此後中韓兩國關係迅速發展，主要體現在體育交流和民間貿易兩個方面。為避免引起朝鮮的不滿和干擾，中國採取“官民有別”“政經分開”的政策和“只做不說”的方針^②，中韓民間交往開始大幅提升。

1986年7月漢城亞運會為中韓關係發展提供了又一個契機。1985年4月中國正式宣佈有意參加漢城亞運會後，朝鮮多次表示不滿、抗議並加以阻攔。^③中國則通過香港渠道向韓方表示，將參加亞運會看作是1986年改善中韓關係的最大工作目標，希望通過亞運會來增進雙邊關係。^④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和蒙古在朝鮮的勸說下均採取了抵制態度，而中國是參加漢城亞運會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⑤儘管亞運會開幕前金浦機場發生了爆炸案，中國仍然派出385名運動員參加了比賽。^⑥為了安撫平壤，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對外宣稱，中國派遣運動員參加漢城亞運會並不意味著與韓國建立外交關係。^⑦儘管如此，亞運會畢竟是中國認知韓國的重要視窗。1987年7月，鄧小平在一份材料上做出批示：與南朝鮮實現關係正常化不能再拖了。隨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成立了由田紀雲副總理任組長的中韓經濟協調小組。^⑧這裡所說的“實現關係正常化”並非外交關係，應該是指經濟關係。11月14日，考慮到同平壤的關係和朝鮮的承受能力，中央外事小組認為目前應繼續遵循中央的方針，只同南朝鮮進行間接貿易。但幾個月後，1988年3月，中共中央便決定將對韓國的間接貿易發展為民間直接貿易。^⑨3月10日，外交部批准山東省通過在韓華僑、華人開展與韓國的民間直接貿易。^⑩

（四）中韓民間關係的跳躍式發展

1988年9月的漢城奧運會是中韓關係變化的重要轉捩點。朝鮮反對在漢城舉辦奧運會，認為這是美國和韓國策劃的“兩個朝鮮”的陰謀，並提出平壤與漢城共同舉辦奧運會，否則朝鮮將發起抵制運動。^⑪中國從維持半島和平穩定的願望出發，表示希望朝鮮南北雙方關於共同舉辦奧運會的談判取得成功。^⑫洛桑會談不可避免地成為平壤和漢城爭取各自政權“合法性”的競技場，1987年7月會談以失敗告終，8月朝鮮拒絕了國際奧委會提出的最終妥協方案。^⑬11月29日大韓航空公司一架客機在安達曼海上空爆炸，造成115人喪生。事後證明定時炸彈是朝鮮特工安裝的，以此對奧運會進行威脅。1988年1月12日朝鮮宣佈不參加南朝鮮單獨舉辦的奧運會，而兩天後，中國便向奧委會遞交了確認參加奧運會的信函。^⑭是年7月，鄧小平在一個報告上批示：“現在看來，發展同南朝鮮經濟、文化關係的時機已經成熟，步子可以比原來設想的更快一些，更寬一些。發展同南朝鮮的關係是我們一著重要的棋子，要抓緊。”^⑮顯然，鄧小平所說的時機就是漢

① 本書編寫組：《李先念傳（1949—1992）》，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1237—1238頁。

② 山東省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關於魯經貿專字452、704號文件的起草說明〉，1988年12月24日，山東省檔案館，A208-02-0025-002。

③ 韓國外交史料館，2016-0067-15，第63—64頁。

④ 韓國外交史料館，2016-0067-19，第65頁。

⑤ Victor D. Cha and Ramon Pacheco Pardo, *Korea: A New History of South and Nort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3), p. 106.

⑥ 《人民日報》1986年9月15日，第1版；1986年8月17日，第1版。

⑦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China*, October 7, 1986, D3.

⑧ 田紀雲：〈懷念小平同志〉，《炎黃春秋》2004年第8期，第3頁。

⑨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辦公廳：《中聯部老部領導談黨的對外工作》（上），2004年4月，未刊，第105—106頁。

⑩ 山東省檔案館，A189-04-0444-001。

⑪ 《參考消息》，1985年8月8日，第3版；《勞動新聞》，1986年5月31日，第6版。

⑫ 《人民日報》1985年12月30日，第3版。

⑬ 謝定元，〈“合法性的競爭”：朝韓奧運會談探析（1984—1988）〉，《邊疆與周邊問題研究》2023年第4期，第37—61頁。

⑭ 《人民日報》1988年1月13日，第3版、1月16日，第3版。

⑮ 中聯部辦公廳：《中聯部老部領導談黨的對外工作》（上），第106頁。

城奧運會，中韓關係由此邁上了一個新臺階。

在此期間，中韓民間經貿關係和人員交往都出現了跳躍式發展，貿易總額1987年為16.79億美元，1988年達到30.87億美元，而1984年只有4.62億美元。^①1988年因公訪華的韓國人達4200人次，是上年（209人次）的20多倍，到韓國出差的中國人也有880人次，是上年（52人次）的17倍。1989年則分別增加到13600人次和9400人次。^②更重要的是奧運會後不久，中國開啟了與韓國高層政治接觸的民間秘密渠道。早在1987年11月，盧泰愚在競選總統時就承諾要在任期內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③盧泰愚上臺伊始，便積極推動對華外交，並接連委派他的親戚、朋友到中國，甚至作出巨額貸款承諾，試圖與中國高層接觸。由於中方缺乏相應的機構接洽，即便有些信息已送達，但最後都沒有回應。^④奧運會結束不久，1988年11月，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CAIFC）成立了“朝鮮工作組”，實際上專項負責對南朝鮮的工作。友聯會是一個有官方背景的民間社團組織，當時的具體負責人金黎（朝鮮族）是中共老幹部，岳楓（葉選寧）是中共元老葉劍英的次子，友聯會的理事都是中國各界知名人士，他們與中國高層有著密切聯繫，而友聯會有關對韓工作則直接對田紀雲領導的中韓經濟協調小組負責。韓方高層派來中國進行聯繫的幾條線索，如韓國國際友好協會會長張致赫、鮮京株式會社（其董事長崔鍾賢是盧泰愚的親家）社長李順石、曾擔任總統政策輔佐官和政務長官的朴哲彥，後來都是通過友聯會與中國高層搭上關係的。^⑤通過這一渠道在兩國領導人之間牽線搭橋、傳遞信息，把民間外交的作用發揮到極致，成為中韓政治關係發展歷史上的一大特色。

（五）中國實際上承認了“兩個朝鮮”

奧運會後中韓經貿關係出現了新動向。1989年1月，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CCPIT）向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KOTRA）提議，中韓在漢城和北京互設辦事處。這兩個機構的代表分別於3月和5月進行互訪，商討設立貿易辦事處。^⑥4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訪問朝鮮，鄧小平讓他帶話給金日成：中國與南朝鮮的經濟關係必須進一步發展，這樣對朝鮮也是有利的。如果今後中國在政治上有所考慮的話，一定會同你們商量。^⑦5月4日韓國財政部長李揆成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亞洲開發銀行大會，成為首位訪問中國的韓國部長級政府官員。^⑧6月發生的天安門事件雖然給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對外關係帶來嚴重負面影響，但對中韓關係的干擾並不大。11月6日金日成訪華，特別向中國領導人強調不要在南朝鮮設立貿易辦事處，不要使朝鮮處於孤立地位。江澤民答應此事可以拖一拖。^⑨然而幾個月後，1990年4月25日，在友聯會的安排下，田紀雲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李順石——這是中國領導人首次會見韓國客人，並請他向韓國領導人轉達中國政府的立場：中國“非常認真對待、非常重視發展兩國關係”。同時提出，中韓“互設貿易代表處勢在必行”，考慮到北朝鮮的立場和承受能力，辦事處最初“可能是民間的、純商業的，但實際上是半

① Cheon Kyung-Hee, *South Korea-China Relations, 1979-1992: The Normalization Process in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2004), p. 136. 統計數字來自韓國通商產業部。

② Cheon Kyung-Hee, *South Korea-China Relations*, p. 127; 李相玉：《轉型中的韓國外交——前外交部長李相玉回憶錄》，首爾：生與夢出版社，2002年，第120頁（이상옥, 『전환기의 한국외교: 이상옥 전 외무장관 외교회고록』, 서울: 삶과꿈, 2002, 제120쪽）。

③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East Asia*, 30 November, 1987, p. 10; 22 December 1987, p. 14.

④ 劉亞洲：《劉亞洲文集》（二），《中共重要歷史文獻資料彙編》第二十七輯，洛杉磯：中文出版物服務中心，2009年，第310—312頁；張雅文：〈中韓建交秘聞錄〉，《南方周末》1995年10月27日，第1版；國立外交院外交安保研究所外交史研究中心編：《韓國外交史口述回憶·第3卷：朝鮮同時加入聯合國》，首爾：國立外交院，2021年，第298頁（국립외교원 외교안보연구소 외교사연구센터 편, 『한국외교사 구술회의: 남북한 UN 동시가입』, 서울: 국립외교원, 2021, 제298쪽）。

⑤ 筆者採訪友聯會朝鮮工作組組長聶曉華記錄，2024年3月31日，北京。

⑥ 李相玉：《轉型中的韓國外交》，第120頁（이상옥, 『전환기의 한국외교』, 제120쪽）。

⑦ 中聯部辦公廳：《中聯部老部領導談黨的對外工作》，第106-107頁。

⑧ 李相玉：《轉型中的韓國外交》，第120頁（이상옥, 『전환기의 한국외교』, 제120쪽）。

⑨ 中聯部辦公廳：《中聯部老部領導談黨的對外工作》，第186—187頁。

官方的”，以後隨著政治形勢和經貿規模的發展，“逐步改變這個機構的性質”。^①6月21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承認，中韓兩國正在就設立貿易辦事處進行談判。^②10月20日中國國際商會與大韓貿易振興公社在北京簽署了互設代表處的協議。這表明中國在經濟上已經實際承認了“兩個朝鮮”，而且“政經分開”正在通過貿易辦事處轉向“政經合一”。中韓建交的大門已經開啟了一道門縫。

（六）中韓建交的大門完全打開

中國很快又邁出了第二步——同意聯合國接納韓國為正式會員國。在“冷戰”的背景下，自朝鮮半島分裂後，南北兩個國家一直被聯合國拒之門外。1985年10月，首爾呼籲朝韓同時加入聯合國，並實現與美日蘇中四國關係正常化，以促進朝鮮半島和平統一。朝鮮認為這樣做的結果將導致半島分裂永久化，形成“兩個朝鮮”的局面，堅持朝韓應首先實行聯邦制，建立高麗民主聯邦共和國，然後以統一的國家形式加入聯合國。^③雙方爭執不下，中國一直支持朝鮮的主張。1988年漢城奧運會後，韓國借著其國際影響大幅提升的優勢，加快了要求入聯的步伐。1989年11月韓國向聯合國提出，如果北方尚未做好準備，應“毫不拖延地接受韓國加入”。1990年第45屆聯合國大會開幕前，東歐國家大部分已承認韓國，蘇韓建交也指日可待。與韓國建交的國家增至142個，而與朝鮮建交的101個國家中84個同時也與韓國有外交關係。在這種形勢下，由於朝鮮南北會談毫無進展，韓國一再表示要單獨申請加入聯合國。^④尤其重要的是，韓國通過秘密渠道把這一要求告知了中方，並希望給予幫助。^⑤

9月20日聯大開幕，9月30日蘇聯與韓國建交。以往都是因為蘇聯作為常任理事國的否決票阻止了韓國入聯，蘇韓建交後，這個障礙已不存在。^⑥在聯大會議上，有71個國家代表發言支持朝韓同時入聯的主張，而沒有一個國家支持朝鮮的單一席位入聯的提案，美國總統布什也發表了支持韓國同時不反對朝鮮加入聯合國的聲明。^⑦此時，韓國能否入聯的關鍵就看中國的態度了。10月，韓國駐京貿易辦事處向青瓦臺傳來消息，中國也認為朝鮮的提案不現實，主張南北兩方同時分別加入聯合國，中國不會在接納韓國入聯的問題上投否決票。^⑧另外，中方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告知，鑒於北南高級會談的進展和中韓關係的發展，希望韓國不要在今年聯大申請入聯，而應繼續與朝鮮協商，同時也給中國留出時間去做朝鮮的工作，爭取明年實現朝韓同時加入聯合國的目標。韓國後來接受了中國的建議，並要求中方在這一問題上發揮積極和建設性作用。^⑨

1991年2月27日，在日本訪問的朝鮮勞動黨中央書記金容淳宣稱，朝鮮堅持以高麗民主聯邦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方案，再次強調了朝鮮半島統一後入聯的原則。^⑩韓國外務部發表聲明針鋒相對地提出，如果朝鮮繼續拒絕分別同時入聯，韓國政府只能在今年第46屆聯合國大會之前單獨申請加入聯合國。朝鮮對此提出嚴厲譴責，韓國外長則在3月8日公開宣佈：無論朝鮮是否反對，

① 《劉亞洲文集》（二），第318—326頁。幾天後，崔鍾賢向盧泰愚轉達了這一信息。盧泰愚，《盧泰愚回憶錄（下卷）：轉換期的大戰略》，首爾：朝鮮新聞社，2011年，第244頁（노태우, 『노태우 회고록（下卷）：전환기의 대戰略』，서울：조선뉴스프레스，2011，제244쪽）。

② 《朝鮮日報》，1990年6月22日，第1版。

③ 李相玉：《轉型中的韓國外交》，第46頁（이상옥, 『전환기의 한국외교』，제46쪽）。

④ 《參考清樣》，1990年10月6日。

⑤ 《韓國外交史口述回憶》第3卷，第287—288頁（『한국외교사 구술회의 3』，제287—288쪽）；Kim Hakjoon, “The Establishment of South Korean-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 A South Kore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13, No. 2 (Summer 1994), pp. 40-41.

⑥ 《韓國外交史口述回憶》第3卷，第30、78、91頁（『한국외교사 구술회의 3』，제30、78、91쪽）。

⑦ 李相玉：《轉型中的韓國外交》，第48—49頁（이상옥, 『전환기의 한국외교』，제48—49쪽）。

⑧ 《韓國外交史口述回憶》第3卷，第101—102頁（『한국외교사 구술회의 3』，제101—102쪽）；李相玉：《轉型中的韓國外交》，第49頁（이상옥, 『전환기의 한국외교』，제49쪽）。

⑨ 《韓國外交史口述回憶》第3卷，第30、102、211頁（『한국외교사 구술회의 3』，제30、102、211쪽）；李相玉：《轉型中的韓國外交》，第58—59頁（이상옥, 『전환기의 한국외교』，제58—59쪽）。

⑩ 《人民日報》，1991年3月1日，第6版。

韓國將在1991年申請加入聯合國，並敦促平壤在入聯問題上採取現實的立場。^①4月7日，韓國向聯合國會員國分發了一份備忘錄，提出韓國將在聯大開幕前單獨提交加入聯合國的申請。^②第二天，《勞動新聞》發表署名文章，譴責這一行徑是“反民族犯罪行為”。4月19日金日成親自出面，以答記者問的方式指出，朝鮮的原則立場是南北方要以單一席位入聯，如果單獨加入聯合國，將對歷史負分裂的責任。^③現在，能夠破此僵局的只有手握否決權的中國。

中國既要保持中韓關係持續升溫的勢頭，又要避免朝鮮陷入國際孤立的困境，就必須說服朝鮮接受現實。^④於是，5月3日中國總理李鵬訪問朝鮮，親自做金日成的工作。儘管朝鮮對李鵬的接待規格大大超過了以往外國元首的待遇^⑤，李鵬也在公開講話中表示支援朝鮮以聯邦制方式實現統一的主張^⑥，但他在私下談話時仍然主動傳達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和態度：如果南北雙方不能就加入聯合國問題達成協議，韓國很可能要求單獨加入，那時中國將感到十分為難。言下之意，中國不能使用否決權。金日成無奈地答道，朝鮮正在尋求解決方案，不會使中國為難。^⑦在5月9日例行的新聞發佈會上，面對李鵬訪朝是否就南北雙方入聯問題進行磋商的提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中國希望朝韓通過對話協商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朝方也表示願意繼續就這一問題與韓方進行協商。^⑧

在中國的勸說和壓力下，為了避免陷入韓國單獨加入聯合國的被動局面，朝鮮被迫搶先採取行動。^⑨5月27日朝鮮外務省發表聲明，表示將正式向聯合國秘書長遞交加入聯合國的申請書。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立即表示，這一決定具有積極意義，將有助於促進朝鮮北南對話和半島的和平與穩定。^⑩根據李鵬與朝方達成的協議，中國外長錢其琛6月訪朝，繼續就入聯問題與朝鮮交換意見。朝鮮最擔心的是聯合國表決時韓國的申請順利通過而朝鮮的申請受阻，要求中國堅決反對聯合國分別討論南北方的申請，如果美國藉口核核查問題否決北方，希望中國也否決南方。錢其琛詳細介紹了聯合國這次審議朝韓同時入聯的程序，並告知中美之間及與其他大國之間已經達成共識，這個問題將合併為一個議案提出，且採取一致鼓掌的方式通過。錢外長還表示，大會期間中國會協助做好各方的工作。^⑪此後，朝韓入聯問題風平浪靜。9月17日，聯合國大會果然未經表決直接通過了46/1號決議，決定同時承認朝韓兩國的聯合國成員國資格。^⑫朝鮮放心，韓國滿意。韓國成為聯合國的正式成員國，實際上就掃清了中韓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政治障礙，中國對韓的外交大門終於打開了。

（七）中國突然提出與韓國儘快建交

儘管中韓建交的大門已經敞開，但中國何時願意跨越這道門檻仍然是一個未知數。1990年9月11日在中朝領導人的瀋陽會談中，金日成要求中國在美朝建交之前不能與南朝鮮發展國家關係。江澤民保證中國絕不會與南朝鮮建立外交關係，目前只是發展經濟關係。鄧小平在聽取彙報後指出，做生意對中韓都有利，需要建立貿易辦事處。至於中韓建交問題，現在不要急，拖兩年、三年甚至五年，拖久一點好。如果朝鮮垮了，中國將要處在美日韓的第一線，沒有中間地帶

① 李相玉：《轉型中的韓國外交》，第57、63頁（이상옥, 『전환기의 한국외교』, 제57、63쪽）。

② 盧泰愚：《盧泰愚回憶錄》（下卷），第387頁（노태우, 『노태우 회고록（下卷）』, 제387쪽）。

③ 《勞動新聞》，1991年4月8日，第5版；4月21日，第1版。

④ 有材料顯示，中國內部判斷朝鮮有可能改變態度。《參考清樣》，1990年10月28日；1991年4月16日。

⑤ 《參考清樣》，1991年5月13日。

⑥ 《人民日報》，1991年5月5日，第1版。

⑦ 李鵬：《和平發展合作：李鵬外事日記》（上），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年，第338、347頁。

⑧ 李相玉：《轉型中的韓國外交》，第82—83頁（이상옥, 『전환기의 한국외교』, 제82-83쪽）。

⑨ 太永浩：《三樓書記室的暗號：前北韓駐英公使太永浩的證詞》，張琪惠譯，臺北：商周出版，2019年，第27—28頁。

⑩ 《人民日報》，1991年5月29日，第6版、第1版。

⑪ 錢其琛：《外交十記》，第153—154頁；萬經章：〈中國在朝、韓同時加入聯合國中的作用〉，《縱橫》2018年第12期，第60頁。

⑫ UN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Yearbook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91, Volume 45* (New York: UN Dept. of Public Information, 1992), pp. 95-96.

了。這在當前是個戰略問題，對朝鮮仍要支持，不要使它有孤立感。^①9月23日，金黎和岳楓會見朴哲彥時轉達了中方的立場：中韓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還是感覺時機尚不成熟。

1991年7月25日，經盧泰愚總統同意，朴哲彥以政府部長和國會議員的身份給中國領導人寫了一封信，建議韓中迅速建立外交關係。得到的回音是“還要等待一段時間”^②。9月初，韓國安全企劃部邀請友聯會理事劉亞洲（中共元老李先念的女婿）秘密訪韓，要他向中國政府轉達一個信息：盧泰愚擬派特使向中國領導人遞交一封親筆信，其意圖是在韓國加入聯合國後繼續推進與中國的交往。劉回國後建議中央接受韓方的請求。^③此事結果如何，目前尚無史料證明。10月2日中韓外長在聯大會議期間首次見面。李相玉感謝中國在入聯問題上發揮的建設性作用，並希望以此為契機推進中韓關係。錢其琛表示，中國支持朝韓對話，希望看到朝日建交和朝美關係改善。中韓關係發展涉及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目前重要的是保持過渡性關係，同時悄悄發展實質性關係。^④

1991年10月4至14日，金日成最後一次訪華。在會談中，金日成再次提出，在美國承認朝鮮之前，“請中國不要同南朝鮮建交”。江澤民回答，中國同南朝鮮只有民間貿易關係。鄧小平說，中朝之間還是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樣對彼此都好。中朝關係特殊，是兄弟而不是同盟。^⑤儘管鄧小平話中確有與朝鮮拉開距離之意，但此時仍未下決心與韓國建交。

1991年11月12日，在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三次部長級會談期間，盧泰愚總統特意接見了錢其琛，並大談兩國之間悠久的歷史，希望儘快建立正常國家關係。錢其琛沒有直接回答，只說中韓兩國近年貿易關係有較大發展，希望繼續下去。^⑥14日上午兩國外長共進早餐。李相玉建議將貿易辦事處升格為官方機構，希望韓中早日實現邦交。錢其琛表示，希望看到中韓關係取得進展，但目前還是以民間方式為好，雙方外交官員可以接觸。至於中韓建交問題的解決，有待南北會談的進展以及朝鮮與美日關係的改善，中國在這些方面會更加努力地提供幫助。^⑦至此，中韓高層溝通透露的信息是，雙方政治交往的大門已經敞開，韓國急於同中國建交，而中國則在謹慎地等待時機。^⑧

1992年初，情況突然發生變化。據韓國駐京貿易辦事處的情報，中國外交部1月4日向宣傳部門發出通知，可以將南朝鮮的稱呼改為“韓國”。^⑨查閱《人民日報》可知，從1月10日起，“韓國”的字樣悄悄地替代“南朝鮮”出現在中國的新聞報導中。這無疑是中國準備公開承認韓國的信號。1月23日，田紀雲在岳楓的安排下會見張致赫，並宣佈中國已經決定與韓國建立外交關係。當張致赫把這一突如其來的消息彙報給盧泰愚和政府時，韓國官員甚至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⑩首任駐韓大使張庭延的回憶也證實了這個事實——錢其琛2月在外交部宣佈：中韓建交的

① 中聯部辦公廳：《中聯部老部領導談黨的對外工作》（上），第190—200、212—214頁。

② 樸哲彥：《為了準確歷史的證言》（2），首爾：蘭登書屋，2005年，第195—197、204—208頁（박철언, 『바른 역사를 위한 증언 (2)』, 서울: 랜덤하우스 중앙, 2005, 제195—197, 204—208쪽)。

③ 《劉亞洲文集》（二），第339—343頁。

④ 李相玉：《轉型中的韓國外交》，第234—138頁（이상옥, 『전환기의 한국외교』, 제134—138쪽）。錢其琛在回憶錄中只是作為“禮節性”見面提到了這次會談。錢其琛：《外交十記》，第146頁。

⑤ 中聯部辦公廳：《中聯部老部領導談黨的對外工作》（上），第201—211頁。

⑥ 盧泰愚：《盧泰愚回憶錄》（下卷），第246頁（노태우, 『노태우 회고록 (下卷)』, 제246쪽）；錢其琛：《外交十記》，第144—146頁。

⑦ 李相玉：《轉型中的韓國外交》，第145—148頁（이상옥, 『전환기의 한국외교』, 제145—148쪽）；錢其琛：《外交十記》，第146—148頁。

⑧ 1991年的最後一天，外貿部發出關於對南朝鮮開展經濟合作有關問題的通知，其中仍然提到：堅決執行中央確定的“政經分開，官民有別”和“只做不說”的原則。對外經濟貿易部辦公廳編：《1991年對外經濟貿易重要文件彙編》，1992年，未刊，第410—412頁。

⑨ 李相玉：《轉型中的韓國外交》，第154頁（이상옥, 『전환기의 한국외교』, 제154쪽）。

⑩ 裴振榮：〈盧泰愚的親筆信令鄧小平感動〉，《朝鮮月刊》2014年9月號，第163—164頁（배진영, “당샤오핑을 감격케 한 노태우 대통령의 진서”, 『월간조선』, 2014년 9월호, 제163—164쪽）。筆者不久前通過聶曉華向張致赫求證了此事。為此，1992年11月盧泰愚向張致赫頒發了建交勳章。

條件已經基本成熟。^①與此同時，韓國外務部也接到貿易辦事處的報告：中國政府內部已決定與韓國建交，李相玉隨即指示駐奧地利大使李時榮訪華時對此求證。2月27日錢其琛在北京接見李大時確證了此事，並希望在4月韓國外長來北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大會時，就建交事宜交換意見。^②

4月13日，錢其琛和李相玉在北京會談時商定，立即開始建交談判。^③幾天後，國家主席楊尚昆利用去平壤為金日成祝壽的機會向朝鮮通報：中國正在考慮與韓國建交，但仍將一如既往地支持朝鮮。金日成希望中方能夠考慮目前南北關係和朝美關係正在發生變化的情況，推遲一年與韓國建交。^④然而，中國的決心已下，開始轉動的車輪無法停止。中韓建交談判的過程快速而簡單，經過一個半月的三輪會談，至6月底完成了全部準備工作。^⑤7月15日，錢其琛赴朝通報了這一結果，金日成很不情願地接受了既成事實。^⑥8月24日，中韓簽署並發表了建交公報。

三、關於中國對韓政策轉變因素的分析

縱觀中韓關係變化的歷史過程可以認為，以往研究者提到的各種因素對中國轉變朝鮮半島政策或多或少都產生了影響。但需要指出的是，中韓關係變化有三個關鍵的時間節點：1984—1985年，中國對韓實行“官民有別、政經分開”的政策，其背景是中國全面推行改革開放，中韓經貿關係迅速升溫。1988—1989年，中韓開始直接貿易，互設貿易辦事處，中國同意韓國加入聯合國，“政經分開”開始轉向“政經合一”。其背景是奧運會推動中韓關係進入高潮，蘇東局勢發生劇變，北京政治風波導致中國陷入外交孤立。最重要的是1992年初，中國突然決定與韓國建交，並立即付諸實施。其背景是鄧小平力排眾議，利用地方改革派勢力，堅持繼續改革開放的發展道路；中美關係走出陰影，戰略合作關係基本恢復；蘇聯解體導致東北亞和國際外交格局變化；朝鮮南北會談取得重大成果，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前景光明。而前述各種因素並不是在同一時段、同一層次上發揮作用的，必須對其給出相應的定位，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國決策的全過程及其改變的原因。

第一，首先應該指出從“一個朝鮮”到“兩個朝鮮”政策轉變的邏輯基礎。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處理國際問題和對外關係的理念發生了重大轉變，即對時代的看法從戰爭與革命轉向和平與發展；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從破壞國際體制轉向進入並維護現存國際體制；外交理念從意識形態主導轉向國家利益優先；外交方針從同盟（陣營）外交轉向不結盟的全方位外交。^⑦在這一基礎上，中國逐漸實現了與半島相關國家日本、美國、蘇聯關係的正常化，而接受“兩個朝鮮”、決定與韓國建交正是上述轉變的邏輯延伸。

第二，中國改變對韓政策特別是與韓國建交，必定有其自身的需求和動力。1988年5—9月期間，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反復指出，同韓國發展民間關係有利無害，經濟上對雙方發展有利，政治上對中國的統一有利，外交上對半島和平與穩定有重要意義，是很重要的戰略棋子。^⑧1990年4月田紀雲提出，中國認識到發展中韓關係是互利的，有利於兩國繁榮昌盛，有利於促進亞洲和

① 延靜：〈歷史的抉擇〉，《報告文學》2008年第1期，第72頁。

② 李相玉：〈轉型中的韓國外交〉，第156—157頁（이상옥, 『전환기의 한국외교』, 제156-157쪽）。

③ 李相玉：〈轉型中的韓國外交〉，第167—169頁（이상옥, 『전환기의 한국외교』, 제167-169쪽）；錢其琛：《外交十記》，第156頁。

④ 延靜：〈歷史的抉擇〉，《報告文學》2008年第1期，第74頁。

⑤ 韓國方面在談判伊始就明確表示，希望儘快建交，韓方沒有任何先決條件。張瑞傑：〈四十年積怨一瞬消——中韓建交往事〉，《世界知識》2002年第17期，第38—39頁。

⑥ 錢其琛：《外交十記》，第158—160頁。

⑦ 關於這一問題的詳細論證，見任曉：〈經驗與理念：中國對外政策思想三十年的發展及其意義〉，《復旦學報》2009年第3期，第36—45頁。

⑧ 錢其琛：《外交十記》，第151頁。

世界和平。^①而這些考慮到1992年初就顯得尤為重要。此時韓國的經濟實力、外交地位和政治影響，對於中國在經濟上迅速發展生產力並融入國際體系，在外交上擺脫被孤立和圍困的國際環境，在政治上拔除台獨勢力在亞洲的最後一個“外交據點”，從而在亞洲乃至世界建立新的經濟秩序和政治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因此，實現與韓國關係的正常化就成為中國自身發展的必然選擇。

第三，中國與韓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必須排除實現中韓關係正常化道路上的障礙，而這個障礙主要來自朝鮮的反對。1989年以前，干擾中韓關係發展的因素看起來是蘇聯，但歸根結底還是朝鮮。由於中蘇對立並且爭奪朝鮮，而朝鮮則在中蘇之間玩弄平衡外交，只要中國與韓國接近，朝鮮就表現出向蘇聯靠攏的傾向，從而引起中國的憂慮和擔心，不得不淺嘗輒止。這也是中國為改善與韓國關係採取的一系列舉措——發展經貿關係、建立貿易辦事處、接受韓國入聯——都步蘇聯後塵的原因。中蘇關係實現正常化以後，蘇聯因素消失，朝鮮阻礙中韓交往的作用便凸顯出來。金日成一直要求中國必須堅守“一個朝鮮”的立場，後來隨著形勢變化朝鮮不得不允許中國與韓國往來，但任何政策性改變需要徵得平壤的同意，服從朝鮮的利益訴求和外交安排。中國之所以受制於此，如鄧小平所說，關鍵在於維持與朝鮮的關係也是一個戰略問題。中朝之間雖有分歧，且日漸加深，但從地緣政治考慮，中國還不能放棄朝鮮。中國在東北亞也需要平衡各種關係，不能為了得到韓國而失去朝鮮。因此，中國排除障礙就是要說服朝鮮，每邁一步都與平壤磋商。中韓建交必須顧及朝鮮的感受，滿足朝鮮的要求，取得朝鮮的同意，鄧小平所謂再等三五年，就是等待條件成熟。

第四，在中國決策者看來，中韓建交的原則是不能傷害朝鮮，破壞中朝關係，基本條件有兩個。其一，朝鮮南北通過談判實現和解。鄧小平在1985年8月就公開說明，中韓關係的建立和發展，主要取決於南北對話的結果。^②經過十幾年南北雙方的接觸和周邊多方的努力，這一條件終於得以實現。1991年12月13日，朝韓達成《南北和解、互不侵犯和交流合作協定》，31日通過《關於朝鮮半島無核化的聯合聲明》，這兩個文件於1992年2月19日正式生效。同時，雙方還簽署了《關於組建北南高級會談小組委員會協議書》。朝鮮總理延亨默強調，這些文件是朝鮮民族向世界特別是向與朝鮮問題有利害關係的周邊國家發出的和平宣言；韓國總理鄭元植指出，這些文件給敵視和對立的時代打上句號，開創了充滿希望和光明的和解合作的新時代。《人民日報》轉載了這些充滿希望和激情的言論。^③朝韓親兄弟已經握手言和，中國與韓國交往自然就不再有所顧忌。這個條件在1992年初成熟了。

其二，半島周邊四國分別與朝韓實現交叉承認。由於朝鮮反對，中國一直不接受交叉承認的原則。1983年11月吳學謙外長訪日時，明確表示拒絕交叉承認。^④中韓關係逐步改善後，1984年12月中國的立場開始鬆動。^⑤1989年2月布什總統訪華，李鵬在會談中表示，中國正在改善與韓國的關係，希望美國對朝鮮也要採取寬容態度，並直接對話。^⑥1991年4月李鵬會見日本外長，要求日本採取更大的主動性，早日同朝鮮建立外交關係，使它不感到孤立，正常地生活在國際大家庭中。^⑦顯然，中國已經接受了交叉承認的原則。1990年9月30日蘇聯宣佈與韓國建交，到年底所有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承認了韓國，這無疑為中國鋪平了“交叉承認”的道路。對此，朝鮮一方

① 《劉亞洲文集》（二），第321頁。

②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063—1065頁。

③ 韓國統一院統一政策室編：《統一白皮書（1992）》，首爾：統一院，1992年，第114—115頁（통일정책실 편저, 『통일백서 1992』, 서울: 통일원, 1992, 제114—115쪽）；《人民日報》，1992年2月20日，第6版。

④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開示文書》，18/04-1028/3，第1—15頁。

⑤ 韓國外交史料館，2014-0008-14，第47—48頁。

⑥ President Bush's Meeting with Premier Li Pe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6 February 1989, 28. Memcon,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⑦ 《外事動態》第5期，1991年4月25日。

面憤怒地指責莫斯科此舉是“背叛”和“虛偽”^①，一方面也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實，抓緊與美日接觸。中國則努力幫助推進朝日、朝美會談，從而為中韓發展政治關係創造另一個條件。

到1990年2月，美朝駐華使館參贊已經會晤七次，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和前駐華大使實現首次訪朝，日本也提出與朝鮮舉行會談改善關係的建議。中聯部就此認為，朝鮮半島軍事對峙的因素減弱，正在向著“交叉接觸”“交叉承認”的方向發展。^②但此時在交叉承認的道路上又冒出了朝鮮核問題。美國和西方國家懷疑朝鮮開發核武器，要求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對其進行檢查。到1991年底和1992年初，美朝駐華參贊級接觸已進行了十八次，在北京的日朝正式會談也進入了第六輪，但均因朝核問題而陷入僵局。^③中國雖然反對在核檢查問題上向平壤施加壓力，但也明確表示支持朝鮮半島無核化，並在私下表示將說服朝鮮接受核檢查。^④1992年1月30日，朝鮮終於同國際原子能機構簽署了核安全協定。^⑤3月10—12日，劉華秋副外長訪美時再次提出中韓和美朝之間的交叉承認問題，美方明確表示兩者不能掛鉤，並堅持認為，在美日與朝鮮實現關係正常化之前，首先要解決朝核問題。^⑥4月9日，朝鮮最高人民會議通過決議，批准了核安全協定，並宣佈可以立即接受核檢查。^⑦4—6月間，朝鮮對美國開展民間外交，金日成頻繁接見美國客人，主人設宴招待，客人贈送禮物，氣氛“溫馨而友好”。^⑧中韓建交談判正是在這種氛圍中開始的。一切進展似乎都很順利。

然而，當1992年8月中韓兩國宣佈建交時，美朝和日朝之間的談判還沒有任何結果，中國預設的交叉承認的條件並未實現，而金日成要求鄧小平再等一年，就是希望在中韓建交前先實現朝美關係正常化。那麼，中國為什麼如此迫不及待地推進建交？

第五，在盧泰愚總統任期內實現與韓國關係的正常化，是中國必須抓住的稍縱即逝的歷史時機。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盧泰愚對中國的友好態度表現得更加鮮明。在美國和大多數西方國家封鎖和孤立中國的危難時刻，通過張致赫和友聯會的渠道，盧泰愚將一封親筆信送到中國領導人手中。信中表示十分理解中國迫不得已動用軍隊的苦衷，並承諾會向同韓國友好的國家轉達這層意思。金黎告訴張致赫，鄧小平看到親筆信後非常感動。^⑨後來，盧泰愚在與美國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及英國首相談到人權問題時，確曾多次替中國做解釋工作。錢其琛得知這一情況後表示，將向中國領導人詳細彙報。^⑩中國把舉辦1990年北京亞運會視為重塑國際形象、擺脫外交困境的重要機會，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為此專門向全國發出通知。^⑪韓國通過廣告、旅遊為這次亞運會提供了大量幫助。^⑫如下表所示，在中國最困難的幾年裡，中韓貿易額和韓國在華投資額卻飛速提升，確實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中國對韓國不得不另眼相看。

① 《勞動新聞》，1990年10月5日，第2版。

② 《政黨與世界》第26期，1990年3月1日。

③ 李相玉：《轉型中的韓國外交》，第151頁（이상옥, 『전환기의 한국외교』, 제151쪽）；Kim Hong Nack, “Japan and North Korea: Normalization Talks Between Pyongyang and Tokyo”, in Young Whan Kihl(ed.), *Korea and the World: Beyond the Cold Wa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pp. 123-125.

④ 李相玉：《轉型中的韓國外交》，第243、367頁（이상옥, 『전환기의 한국외교』, 제243、367쪽）；Lee Chae-jin, *China and Korea: Dynamic Relation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1996), pp. 93-94.

⑤ 《人民日報》，1992年2月1日，第6版。

⑥ 李相玉：《轉型中的韓國外交》，第151頁（이상옥, 『전환기의 한국외교』, 제151쪽）。

⑦ 《人民日報》，1992年4月10日，第6版。

⑧ 《勞動新聞》，1992年4月3日，第1版；4月13日，第2版；6月2日，第1版；6月29日，第1版。

⑨ 裴振榮：〈盧泰愚的親筆信令鄧小平感動〉，《朝鮮月刊》2014年9月號，第160—161頁（배진영, “당사야핑을 감격케 한 노태우 대통령의 친서”, 제160—161쪽）。關於盧泰愚的信，我曾向鄧小平的女兒毛毛求證。她告訴我，鄧確曾收到過韓國總統的一封信，但他遇事從不喜形於色。

⑩ 盧泰愚：《盧泰愚回憶錄》（下卷），第247—248頁（노태우, 『노태우 회고록 (下卷)』, 제247—248쪽）。

⑪ 安徽省鳳陽縣檔案館，1990XW02，第41—44頁。

⑫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October 4, 1990, p. 26；國立外交院外交安保研究所外交史研究中心編：《韓國外交史口述回憶·第1卷：中韓建交》，首爾：國立外交院，2020年，第188頁（국립외교원 외교안보연구소 외교사연구센터 편, 『한국외교사 구술회의 1: 한중수교』, 서울: 국립외교원, 2020, 제188쪽）。

表1：1989—1992年韓國對華貿易和投資^①

	中韓貿易	韓國在華投資項目及金額	
	(億美元)	(個)	(百萬美元)
1989	31.43	17	14.2
1990	38.21	39	54.6
1991	58.12	116	83.2
1992	82.18	269	221.4

就在中國最需要韓國的時候，1992年底韓國將迎來大選，而下屆政府對華政策如何則難以預料。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於是，中國確定了在盧泰愚任期內完成建交談判的目標。^②

四、結論

韓國早在1970年代初就提出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並且始終保持積極、主動、熱情的態度，而中國的對韓政策直到1980年才提出“關門不上鎖”的方針，此後又經歷了複雜的變化：1983年開始鬆動，同意人員交流和貿易往來；1985年決定調整，採取“政經分開”的方針，推進雙邊民間關係發展；1988年做出重大改變，開始考慮建立外交關係，並採取了“三步走”的策略，即互設貿易代表處—推動韓國與朝鮮同時入聯—與韓國正式建交；1992年初突然通知韓國進行談判，並迅速完成了建交過程。從劫機事件和魚雷艇事件的妥善處理，到漢城奧運會和北京亞運會的成功舉辦，中國在與韓國關係實現正常化的過程中看似被動，步步都被韓國推著走，但實際上也有其內在的動力和需求。

中國對朝鮮半島的外交方針從“一個朝鮮”轉變為“兩個朝鮮”，最根本的原因和內在動力在於中國實行並堅持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的國策。而實現這一國策，就必然要求中國放棄以意識形態為主導的外交理念，採取務實平衡的對外政策，構建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經濟需求和外交目標共同奠定了中國改變對韓國政策的基礎。

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是中美和解後兩個大國的一致立場和共同主張。中美合作既是東北亞地區局勢平穩的基本保障，也是促進中韓關係發展的積極因素和助力。這不僅表現在中美關係正常化為韓國改變對華政策提供了機會和條件，更體現在中美密切合作推動了“交叉承認”和朝韓同時入聯。

在中蘇對抗的背景下，蘇聯是中國調整朝鮮半島政策的制約因素；中蘇關係正常化以後，蘇聯成為中國改變對韓政策的“掩護”和借助力量。從發展對韓經貿關係到接受韓國加入聯合國再到與韓國建交，蘇聯都在為中國“打前站”，客觀上消滅了中國採取同樣政策而來自朝鮮的壓力。

朝鮮是中國改善與韓國關係的最根本的障礙和阻力。蘇聯和中國相繼與韓國建交，徹底瓦解了與美日韓對抗的中蘇朝三角同盟，這是朝鮮無論如何也難以接受的局面。隨著中國推進“改革開放”的基本方針，中朝之間的分歧日益加大，朝鮮在經濟和外交上都已成為中國的負擔。儘管認識到中朝已經不是同盟關係，但中國始終沒有放下這個歷史包袱，繼續將平壤視為“戰略”夥伴，因而無法擺脫朝鮮的束縛和羈絆。

① 表中的貿易數字來自韓國通商產業部，投資數字來自韓國國家銀行。見Cheon Kyung-Hee, *South Korea-China Relations*, p. 136; Chung Jae Ho, *Between Ally and Partner*, p. 50。

② 延靜：《出使韓國》，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7—18頁；《韓國外交史口述回憶》第1卷，第207頁（『한국의 교사 구술회의 1』，제207쪽）。

中國應朝鮮要求而確定的與韓國建交的前提是南北關係實現和解、美國與朝鮮建交，而中國認為這些條件在1992年初已經實現或即將實現，因此決定在盧泰愚任期內完成與韓國建交。此後，美朝關係正常化談判因朝鮮核核查問題而擱置，但此時中韓建交談判已經開始，無法回頭。結果，中國本無意冷落和開罪平壤，卻引起朝鮮的強烈不滿和敵意。

總之，“冷戰”結束不久，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實現了從“一個朝鮮”到“兩個朝鮮”的轉變，成為在亞洲乃至國際上唯一可以與南北朝鮮同時保持友好關係且施加外交影響的大國，從而既改善了經濟環境，擺脫了外交孤立，又在美日韓同盟中打入一個楔子。看起來，中國對朝鮮半島政策的轉變是成功的，東北亞地區也顯露出和平的曙光。然而，此後不到一年就爆發了朝核危機，朝鮮半島再次緊張起來，而這種動盪不安的局面竟然延續到今天。個中原因，有待相關歷史檔案開放後再行討論，或許那時也需要對本文的某些結論進行重新思考。

[責任編輯：晉暉]